

Makesizhuyi Shiyu Xia De Wenti Yanjiu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

吕国忱 著

 人民出版社

014035935

A81
207

Makesizhuyi Shiyu Xia De Wenti Yanjiu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

吕国忱 著



北航

C1723150

A81/207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吕国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3149-8

I. ①马… II. ①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520 号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

MAKESI ZHUYI SHIYU XIA DE WENTI YANJIU

吕国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149-8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出版著作,彼此交流,相互切磋,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在这里,借用黑格尔的观点,序言之类的东西对哲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哲学总要有所交代,要把自己思想的内容整理一下,以便有个逻辑。

注重逻辑体系,容易疏漏突发奇想;重视学术问题,容易忽视体系考量。在两难推理、各有侧重中,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或许在忐忑不安中寻求自我安慰。“制定纲要这往往是一种华而不实、虚张声势的精神工作,人们通过它来表现一种有创造性的天才的神气,所要求的是连自己也给不出的东西,所责备的是连自己也不能做得更好的事,所提出的是连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的东西。然而对于一般理性批判的一个完善的计划,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表白一些虔诚的愿望的话,那么所要求的就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多些。”^①这是形成本书框架的初衷,从不同角度和方面,使读者看到,“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②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指出:“当我们一旦弄清楚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时,当我们弄清楚了人类各种经验的形式也和认识同样重要时: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算打通最广义的、关于人的哲学研究的道路。”^③在纷然杂陈的哲学史上,人们把康德作为二元论的代表,把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例子。这些往往是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

①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③ 莫尔顿·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理论体系,扼杀了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事实上,康德辩证分析了历史成见,论证知识何以可能,使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统一于现象界。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康德思想,感到要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用概念世界进行高度概括。他在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的两个端项和一个中项中,用主体客体进行解释。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中提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概念和客观性……的一致”,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肯定和列宁的发展。

为什么康德和黑格尔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打破了传统体系,进行前提批判,形成新的理论学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①虽然恩格斯没有直接把这段话与黑格尔直接联系起来,但意义极其深刻。在恩格斯看来,“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不能各持一端,不能沿用传统体系进行两极对立,而是重新确立“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才能形成新的学说。马克斯·舍勒也表达了他的观点:“哲学就其本质意向而言,应当提供出绝对没有任何前提的认识,换句话说,为了不先行作出有关真假的哲学判断,哲学应当尽一切实际可能提供不受任何前提约束的认识。”^②无论是“没有任何前提”还是“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其含义是指,确定一个前提,就容易在立意、体系、功能等方面受其所制约。同时,前提的先行存在,虽然具有确定性和问题指向性,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容易形成以支流替换主流。“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王安石)进行前提批判、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才能把理论推向前进。当然,也不能彻底抛弃任何前提,而是把传承与发展统一起来,进行辩证对待。无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可沟通性、非指向性、离散性、解构、颠覆、反叛;还是我国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平台。

“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②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4页。

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①当今世界,打破了往日宁静,迎来了新时代。产生这种现象有其文化基因。而哲学又是形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哲学没有固定前提,而是不断捕捉、预见、引导人类精神生成。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与超越,才能实现人类的安身立命。在市场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只有重新确定主题、开阔思路、增添路径,才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只有打破严密的传统体系,以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为导向,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探讨,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对我国现状进行深层分析和高度概括,提取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打破各自为政的狭隘眼界,实现学科交叉的合理回归;对传统观念走向边缘、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所形成的不稳定因素,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总体概括,形成以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相互辉映的文化大观;对经济建设既强调各有特色的治理方法,又强调统一协调的管理理念;哲学是社会现实的理论升华,实践又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引擎,只有深入分析实践的各种要素以及实践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才能透过相互碰撞与纠缠的种种迷雾,把社会推向前进。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社会转型,使人们不断摆脱精神危机和失落,在碰撞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家园,研究和塑造新世纪的精神依托。哲学是精神文化发展和演进的产物,是精神文化创造中所体现的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哲学把这种时代精神加以概括和提升,而且又以普遍性的精神原则渗透和贯穿到文化的全过程。文化是哲学的铺垫和存在家园,文化的性质、形式和具体过程都通过哲学体现出来。一般说来,哲学不仅要自我批判和发展,对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原则不断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评价和自我扬弃,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理论原则,实现哲学的自身发展。哲学还要对既存的精神文化诸形态不断进行批判,其中既包括理论批判又包括实践批判,并把它作为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哲学的自我批判和对文化的审视、对文化的创造与演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哲学与文化的新的飞跃。哲学不只是孤立地、抽象地思维着的头脑中的产物,而是在人类文化创造与演进的过程中提升出来,反过来又对文化的创造与演进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哲学离开精神文化的历史背景是不可能存在的。精神文化离开了哲学,就将是没有灵魂的、盲目的和杂乱无章的。离开文化舞台

^①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0页。

的哲学和没有哲学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哲学把握着文化之根本,像迷雾一样笼罩在周围而又充满神秘;像细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像清风一样,轻轻拂面,体贴人生。或者说,哲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为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平台,为文化普及开创新领域,为知识创新开阔了新的思路。总而言之,在新的时代,人类文化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趋向,而终极关怀又与人生保持必要张力,需要人们在新的处女地上开垦和收获。充分体现对崇高境界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精神文化的审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21世纪,是高思维、高科技、高速度的世纪。这就迫使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认识和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反思、批判和预见社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一种更深刻、更适用的求智方法和思维范式。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基于这样的考虑,对哲学进行探讨,以便与改革大潮相适应。捕捉社会课题,在一方净土上清风细雨,耕耘劳作,才能在阳光雨露中,聚细流、纳百川,参与论争,甚感欣慰。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和存在形态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转折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	11
第三节 差异多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维	2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	32
第五节 哲学的发展趋势	42
第二章 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论和真理观	53
第一节 物质观的多样性及其整合	53
第二节 在对象化关系中把握客观存在	61
第三节 主体客体、主体间性的哲学地位	68
第四节 实践是哲学的基础与核心	91
第五节 在主客二分框架下厘定现象	105
第六节 认识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	123
第七节 认识与实践的错位现象	143
第八节 真理、价值和实践检验	158
第三章 科技—生态与人的行为规范	177
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生态平衡的关系	177

第二节 西方生态危机理论的借鉴	192
第三节 科技和行为准则	200
第四节 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种解读	209
第五节 中国科技困境存在的原因	218
第四章 社会、文化的相互渗透	231
第一节 不同时代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进程	231
第二节 个体心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	239
第三节 改革和人的全面发展	250
第四节 社会发展动力分析	258
第五节 社会发展方法和策略	266
第六节 文化对社会的引领与渗透	280
第五章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302
第一节 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	302
第二节 从冲突到共享是经济发展的途径	311
第三节 经济发展方式的多维探索	317
第四节 树立市场经济的主体意识	322
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3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 和存在形态

一与多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老子在《道德经》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提出天地未分的“天人合一”，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思维与存在合二为“一”，高度的抽象与思辨是古代的高明之处。近代哲学，强调一元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研究方法，是从“知识总汇”中分化的结果。到了现代，复杂性、多样性成为研究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实践为基础，对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认识方式的一元本质和多样存在形态做了高度概括，从而形成具有特质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转折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社会科学、社会运动、社会事变比自然科学错综复杂，也必然随着重大社会事变的到来更新自己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共运、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事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时捕捉社会需求，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全方位进行理论探索，扬弃传统的甚至权威的理论话语，提出科学思想体系，把社会推向前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结合历史事变和社会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社会必将健康有序、蓬勃发展。

我国经济崛起、社会秩序井然、思想情绪稳定、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成果。对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国际共运、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转折点进行反思，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

世界精神的伟大财富,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坚苦卓绝过程。深入挖掘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明确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

一、从“国际共运”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给人民群众创建了科学理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社会制度的成功转型,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给人类创造了精神财富,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现状,不是教条,而是不断纠正自身的不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共产党宣言》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指引了前进方向,因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共产党宣言》诞生 20 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今天还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大工业和工人政党的发展,这个纲领现在有些“旧形式已经过时了”^①。经验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恩格斯在 1895 年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1848 年革命时期)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因为取得的成就而停止不前,而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应对各种挑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向导。

结合社会实践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丰富理论,与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有直接联系,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指向性。马克思文本资源在一百多年前初步形成,对它的理解往往也因面对的具体情形不同而千差万别。由于从德文翻译和从俄文再转译,是否真正体现马克思的本意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249 页。

在着问题,即使面对同一读本,也因国情和文化底蕴的不同,对理论的解读也难免打上了折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许多理论家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些理论家对问题的分析,往往也因广度、深度和时间跨度的差异各有侧重。尽管我们力图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在解读的具体过程中也难以避免误解和隐患的可能,甚至达到“以讹传讹”的程度。人们希望在马克思在世时通过通信等形式达到观点的精准,但有许多重要成果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很长时间才公布于众,这就使先前理解与后来思想出现误差。有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健在和逝世后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同时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性的,而欧洲与亚西亚地域条件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在同一地域不同国家文化特点不同,即使同一地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人的认识也不一定完全同步,或者带有前瞻性,或者带有滞后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元本质规定,但却有多样存在形态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争论是正常现象,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如果力图定于一准,与崇拜圣经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丰富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全集大约有120卷,在“国际共运”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版面世,每个读者的社会实践和理论资源相互有差别,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还没有掌握。“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关于全球化、世界市场的思想,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想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充满了未来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这需要我们来挖掘和掌握。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看来充满了批判、斗争、冲突的特点,但它不能代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尽管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文字依据,但是即使在我们掌握的资源中,也很难真正理解它的全貌。不夸张地说,在已经出版面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还有我们没有涉猎的盲点,何况德文晚期思想目前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理论资源,这很容易出现以点带面的空档。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有关,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与不同的历史跨度难以愈合也有关。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当人们受某种前见、偏见的束缚,就不一定完全客观地如实地理解它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专著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使用的范畴的特定内涵也不一样。当人们着重理解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对另一部分没有给予同样关注的时候,就可能受当时历史背景的熏陶对其中所讲的对立、冲突格外注意,而对理论基点和未来走向等内容

有所忽视。”^①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角度描述释义学,提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做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人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②在这一前提下,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还容易出现老套与新见的争执。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后,这一问题错综复杂。首先,在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马克思寄予厚望。由于巴黎公社失败,不同思潮的斗争和派别的分裂,欧美工人运动新发展,各国政府的镇压与围剿,欧洲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和民族权利,国家的普遍建立与巩固,导致了第一国际走向解散。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自由资本主义阶级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结论,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命题,但由于各个国家势力的增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力量势必有所削弱。拉萨尔派提出的“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活动”,“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已下降到次要地位。马克思在国际宣布解散当年,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创立的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尝试……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③形成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在后来世界大战导致的第二国际解体,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列宁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事实,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有重大差别或者有重大发展。

“国际共运”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社会,建立起人人平等,消除了阶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的社会。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等理论中,社会主义社会不存

① 吕国忱等:《马克思主义从冲突到和谐的转换机制》,《理论探讨》2006年第3期。

②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在货币。但考茨基与此相反,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没有货币,“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它能在一个像现代生产过程中那样复杂,而且还有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的社会机体中,促成产品的周转并把它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它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按其爱好(当然要在各自的经济力量限度内)满足其需要的手段。”^①可以说,“考茨基是第一批对那种消除了货币的自然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念提出质疑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之一。”^②考茨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的通俗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编辑出版被认为是《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多次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成为第二国际主要理论代表和领导人之一。伯恩斯坦提出“股份在社会阶梯上再现了由于企业积累而产生的生产头领被工业中排除出来的中间环节”。^③推进股份制的法律,可以“为工人和职员开辟了从工厂的附庸变为在社会法律意义上的股东或同伙者的可能性”。^④他指出,实行股份制,“在经济领域中,在生产、贸易和交通中能带来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率。如果我们着手进行社会化,那么我们就应当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所采用的以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否真正能使我们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⑤“不管我们面向哪里,我们都看到,事物比用集中、剥夺、组织、联合这几个字眼所能解决的要错综复杂得不知多少,无论如何,联合也罢,不联合也罢,首先仍旧有非常多的、数以十万计的营业不是由公家负责经营而不自负盈亏的?”^⑥等等。可以设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斯坦大胆提出过分强调“公家”、“联合”,不一定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解决方法是经济多元化。他的“股份制社会主义”,在我国改革以前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或先导作用。

① [德]考茨基:《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② [美]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③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09页。

④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66页。

⑤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83页。

⑥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9页。

马克思早期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随着社会的发展,斗争的性质、方法都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也进行自我调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东方社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葛兰西认为,在东方社会,国家就是一切,集中体现了暴力和强权。而西方社会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革命的根本原则之一便是社会契约、协商、舆论监督、选举、议会等。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明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后期的自我调节,实现了传统理论新的拐点。日本的明治维新,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促进社会转型,在欧洲这样的事例更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趋势也有预测。所以伯恩斯坦说:“如果有人要把这种观点称为‘修正主义’,那末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总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①柯尔施看到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所提出来的社会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彼此依赖”思想,“构成了一切修改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者’的主要资料。”^②伯恩斯坦十分推崇普选制和议会制,把普选制看做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能够翻转整个世界的“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国当前重视谈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摆脱了旧社会制度的压抑,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但是,在苏联实现了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以前提出的“真正的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公民的所有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的论断,在1921年8月提出“‘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因为“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③在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共同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④伯恩斯坦

①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3页。

②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④ 王学东:《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反驳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指出马克思的预测并没有被论证,他认为尽管资本家产业的集中过程很显著,但它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资本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分散。这种观点,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发生重要变化、各种观点不断出炉的关键时刻,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相互比较与辩证综合中,克服自身的缺欠,吸纳百家之长,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考茨基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的主要领袖。伯恩斯坦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者。他们从不同方面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解放了思想,差异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日益增强,证明了考茨基、伯恩斯坦许多观点的可行性。但是,在理论界,总存在一种计划经济模式理解下的“国际共运”,总是把考茨基、伯恩斯坦称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典型,与当前的世界潮流是相违背的。

二、从“五四运动”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价值观受到质疑和挑战,军阀内战、割据一方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从西方引进的并且寄予厚望的新的文化观也难以得到认同,从发达国家引进的高科技也派不上用场。在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理不清头绪的关键时刻,在人们处于迷茫、无所适从的重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探讨出路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的艰辛历程进行求索,走出一条曲折的但前途光明的大道。

具体说,陈独秀对五四运动做了分析:“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视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形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运动的机会;……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①

在上海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 1868 年创办的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万国公报》,以“同气连枝”、“共见共识”为宗旨,第一次提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17 页。

到马克思学说。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马克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社会主义之泰斗”。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叙述了马恩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1906年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马君武等人,热情高涨,一边在日本留学,一边创办报刊杂志,把介绍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潮宣传的内容之一。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有较多的接触,赞誉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全凭事实,不尚理想”,“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地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最彻底和最有心得”^①,中国也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见,孙中山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崇敬和敬仰意义深远。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从其他各种新思潮中脱颖而出,有来自俄国的,也有来自日本、法国、美国和德国的。蔡元培指出:“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②人们普遍看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提倡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来,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深受青年的欢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先后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主张中国人民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前进。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早期革命运动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由学生率先发起、中国工人运动积极配合的爱国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作为一场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运动,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突出了思想运动的大众化,从不同角度与侧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营。

五四运动讲科学精神,在各种思潮大激荡,大碰撞的迷雾中,正确分析了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362页。

② 《蔡元培政治论著》,高平叔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